

文 史 资 料

第 七 辑

政协吉林省白城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

1988年12月

目 录

- 福丰达商号兴衰简述……………丘凌云 (1)
- 从民国到伪满时的汇源涌烧锅……………张寿彭 (18)
- 在洮辽镇守使署军法处的见闻……………黄显升 (37)
- 关于张海鹏的历史见闻……………黄显升 (44)
- 伪满时的保甲制、街村制……………黄显升 (48)

福丰达商号兴衰简述

岳凌云 口述

福丰达是民国年间黑龙江省督军万福麟独资在白城子开的买卖。它开始不叫福丰达，而叫福合义。这个买卖有丝房、粮栈、油坊、粮米铺，还有当铺。整个买卖资金虽只有几万，但在当时城内只有1万多人口，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小白城子来说，可谓是洮安县（现在白城市）第一家大商号了。尤其它是督军开的买卖，财多势大，更是一般商人可望而不可及的。

我是民国十八年春天，经同乡、福合义管院子的邱稔普介绍并做保，从洮南来白城子福合义的。我是河北省宁河县人，乍来东北先是到的洮南。奉天粮秣场场长刘尚清（后曾任省长）在洮南开的大源东烧锅，我在那里干了两三年，后来烧锅黄了，我才到白城子来。旧社会在买卖家住地方（工作），换一个的地方，既不看你的“工龄”，也不看你的“资历”，尽管你曾当过掌柜的也好，在新的地方，也必须从新学（做）起。我到了福合义，便派在账桌先生符麟书的手下，帮助记账并干些零碎事务。

福合义商号主要在现在的市百货大楼路东南的邮电大楼处，从南到北整占一号街坊（南北60丈长、东西12丈宽）。南边从东到西共有12间门市房。原来靠东边三间是当铺，听说掌柜的姓王，人称“王老庆”，等我到福合义的时候，这个当铺已经黄了。过去物品典当最长时间是3年，

即使当舖黄了，仍然有人料理。我到福合义时，东边七间是粮米铺，靠西五间（带转筒）是丝房，临西街往北的两间也是丝房，整个丝房铺面7间成一体，呈凹形。后院则是油坊、磨坊、粮囤和仓库等。最北头，也就是现市工会及其小礼堂处，原打算修一个小型的火力发电厂，以便供给福合义（即后来的福丰达）买卖和“老万大楼”用电。发电机组和设备什么也没买来，就把房子盖了起来，并在上面铺上了洋瓦。房子盖完了，发电设备也没有买到，不久便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这房子一直空着，后来就叫白城子街公所给占用了。

“老万大楼”正在修建。那街基是万福麟亲自选定购买的。万福麟在白城子（洮安县城）任过帮统，但他的家，一直在洮南，虽在白城子以北占了地，建立了窝堡（即帮统窝堡），家也没有迁来。“老万大楼”虽然修在城内，但却位于城西北一角，很僻静。据说万福麟这个人很迷信，到哪里买街基都要第1号。因为过去排列都是先上后下、先左后右，如用《千字文》作顺序则是“天地元黄，宇宙洪荒……”。第1号就是“天”字号了。他要把自己将来的住宅建筑在这吉祥地段上，以享晚年清福。不料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了，日本侵略军进了白城子，就把那大楼没收，做为日本守备队的兵营了。后来日本守备队搬迁到现麻袋厂地址，“老万大楼”又成了关东军经理部的一个仓库，直到1945年东北光复。

福合义以粮业为主，大掌柜的（总经理）张翰臣，人称“张老翰”，是河北昌黎人，是万福麟的军需处长请来的，具体经历不详；二掌柜的（副总经理）孟化民，是河北抚宁人，张翰臣当时已有60岁，总揽全局，孟化民专管外柜。

粮业方面掌柜的还有杜绪堂，专管跑外；账桌掌柜的符麟书，人称管账先生；下面还有几个各管一面小掌柜的，如院心掌柜的，油坊掌柜的，碾米房掌柜的，等等。当时白城子没有电，碾米全用牲畜拉的旧式碾磨；榨油也是陈旧的人工立式榨法。榨油前先将黄豆蒸过，再用碾子轧成扁，接着上锅蒸豆坯，最后用人工进行机械挤压，每班四、五个人，劳动强度很大，每百斤黄豆只榨出豆油十二、三斤。

丝房有20多人。原先有个大掌柜的也是河北人，后来走了。我到福合义的时候，丝房大掌柜的是高明久，河北昌黎人，家属住洮南；二掌柜的周宪章，河北乐亭人，他专跑外。那时营口是水旱码头，沈阳是各处货物的聚集地，他经常去这两地采购。主要采购布匹、化妆品、红白糖和些洋货，同时也采购一些绫罗绸缎、呢绒等高档货。但白城子还是农村人口多，街内居民多不富裕，销量最多的还是粗布、大尺布以及关内来的家织布等。

民国十八年我到福合义的时候，正盖烧锅的厂房和门市房。地址就在当时白城子街的东门里正大街路北，即现在白城酿酒总厂的厂址。那里除临街有几间土房外，里面没有一户人家，全是菜地。此地是2号半街基，即东边北部有半号街基为烧锅所有，它的南部半号街基为万福麟妻弟韩家所有。

由于近九十年外国列强的入侵，一些有识之士悟出：要兴盛中华，必须发展实业，“实业救国”已成为当时一股社会潮流。身为黑龙江省督军的万福麟自然不甘心落后。建烧锅需要一大笔资金，一般人家也建不起。但对一个督军来讲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区区小数。建烧锅虽不是赚大钱的买卖，但“旱涝保收”，多少都有些收益，不会冒有蚀本的风

险。何况当时白城子周围粮食多，原料充足，交通方便，所以万福麟办实业就选择了这个行业。

民国十八年秋天烧锅建成开业，遂将此烧锅、福合义及其所属买卖均改为福丰达。

福合义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开的业，我说不太清楚。但在民国十九年春天结账时我参加了，听他们讲，这是福合义买卖的第三个账期。过去买卖家，东西双方都是三年一结账，据此推算福合义开业时间，应在民国十二年或民国十三年。

这次结账，福丰达及其丝房等买卖，去掉东西各股的分红，实有资金是十万零八千元，在白城子可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。

改称为福丰达后，它的东头是福丰达烧锅，兼粮栈和榨油，人员有80余人。每年一到秋天，烧锅分两个甑房作业，早晚各两班干活，每班出酒600来斤，一天就出2,000多斤酒，直到春节过后，才改为一班，一年净出酒50多万斤。酒柜掌柜的是于楚珩，兼做酒曲子。账桌掌柜的是岳凌云（符麟书在民国十九年春天离开福丰达）以及其他小掌柜的。在福丰达烧锅门市房最东边的三间是当铺，名叫福丰当，掌柜的是艾从周（九卿），下有七、八个人。福丰达的西头即原福合义的地址，10多间房子完全成了丝房，又在东头烧锅的最西边三间建立一个分号，人也增多了，两处丝房有50余人，成了当时白城子街内最大的买卖了。民国十九年又设了福丰达木厂，地址就在现地区商业大楼东原明仁派出所的房子。正房是万福麟大哥万福太住，东厢房的几间就是木厂。门都朝东开，人员有20多人，掌柜的是陈耀先和徐恩波。

福丰达虽是万福麟的独家资本，但从当时的账面上看，

还各有细目，并不是万福麟一个人的钱。如账上记载的福寿堂，那才是万福麟个人的钱。当时福丰达是10万零8千元，3,000元为一个股，属万福麟本人的有20多个股，万福麟有4房太太，还有儿子、儿媳、女儿等都有股，我只记得耘子堂是万福麟某子女的钱，其他还叫什么堂的就记不清了，这有十多个股，合起来老万家是36个股，这是东股。西股（即人身股）给14个，不能超过，合起来是50个股，西股最多的是张翰臣，他一个股，孟化民、高明久是9厘，陈耀先是6厘，其他小掌柜也都有身份股，分别为5厘、3厘、2厘不等。

老万家的人虽出钱，但谁也不过问买卖的事。福丰达有事如给谁提人身股份、生产经营状况等都找督军府里的军需处长李冠三，他管事，李冠三是在什么时候在万福麟手下当军需处长的，这我不清楚。在万福麟没当督军前，李冠三就住在白城子，万福麟当上督军之后，他把家也搬到齐齐哈尔去了。他有时就来一趟白城子，有啥事大掌柜的张翰臣也去齐齐哈尔去找李冠三。李冠三也有身份股，是1个2厘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万福麟带兵撤到了关内，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，李冠三也就不来白城子了。万福麟还有一个管事的，叫王惠臣，家住洮南，他经常来白城子，但王惠臣不管买卖及烧锅的事，而是经管万福麟的地产。因福丰达是万福麟的买卖，所以，他一来自城子，就住在烧锅里，烧锅就按照大掌柜的身份招待他。

万福麟都有那些地产，详细情况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帮统窝堡（我市侯家乡民乐村驻地）有万福麟的地，还有白城子当时北郊的万家屯（现已是市内，即市房产局材料厂处）

及其东边的窑地，都归王惠臣管。那窑地是民国十六年建的，烧出的砖都是大方青砖，烧出后，除自己买卖盖房子外，还有一部分出卖。后来，这窑地被日伪政府没收了，万家屯的房屋也叫日本人给占用了（1942年伪满保安局在此地建无线电监视台）。万家的地产也就剩帮统窝堡了。

东头福丰达烧锅院内东部是两个烧酒的甑房，西边就是油房和碾磨房，最北边是宿舍和伙房，最东边北部那半号街基就是装粮食的囤子了。特别是到了秋冬之际，粮囤一个挨着一个。收购上来的大豆等全放在院内。甚至油坊、甑房外边的空地，房屋中间的过道都囤上了莢子以及堆满了装满粮食的麻袋。这个时节是孟化民掌柜的最忙的时节，为把收购上来的粮食及时销售出去，他经常外出，到营口、四平等地，与粮商订货，往外发运粮食。对外来客商来白城子购买粮食，福丰达的经理便殷切接待。这时雇用的零工也最多，院内车辆出出进进，卸粮的、垛垛的来来往往，么斗声、喊号声不绝于耳。

福达丰的总经理张翰臣思想比较保守，总也不敢冒险，向银行多贷款，多储粮。所以，一过冬天，除自己留一部分碾米、榨油的粮食外，基本上也就没有多少了。在一般情况下，碾米、榨油所用的粮食也不多储备，所缺的部分粮食，在春夏换季时再以贱价收购一部分，弥补生产上之不足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后，白城子街内虽有几家大买卖，但都不如福丰达的财力雄厚。丝房业，如义增兴、同兴德、福和隆、宏增东、大兴东、福顺和、永和成等，但能抵上福丰达丝房经营规模的却没有；粮栈业，如玉兴栈、三泰栈、义和福、人和义、东昌盛、通记粮栈等，福

丰达作为和栈也排在前头；烧锅只有汇源涌烧锅，但远不如福丰达烧锅，再其他就是一些下杂货、家眷铺了，与福丰达更谈不上相比了。所以，福丰达是当时左右白城子街面经济的最大的买卖家。

有人说汇源涌的酒好，也有人说福丰达的酒好，那是一个人一个口味。但白城子的酒，在当时是比洮南的酒要好些，因为白城子水好，洮南的水，碱性则较大。

福丰达的酒主要是装酒篓用火车外运，多销往营口，到那里装船或找买卖家代销。往北主要销往王爷庙（今乌兰浩特市）及阿尔山等地林区。福丰达还在王爷庙设立一个局子（分号），平时有几个人卖酒，到秋天还带收粮食，忙时则有10多个人。在长春西四马路有一个同增庆，是个大粮米店，他们曾代销福丰达的白酒多年。

那时福丰达的酒没有瓶装，外运全用酒篓。酒篓是用柳条编成，里而糊纸，糊一层纸后，即用猪血涂抹一次，这样糊过二、三十层纸后，再用石灰进行处理，篓里就能装酒了。这种酒篓坚固而轻，装酒不跑味。那时出的酒，篓装的都保持60度左右，零散卖的酒，也保持在55度以上。

西头是福丰达丝房。在福丰达烧锅建成后不久，丝房的旧房全进行了整修，整修的门市房是5间。东边紧邻县商务会，又接转筒共9间。大掌柜的是高明久，二掌柜的周宪章，下边还有5个小掌柜的。账桌先生李子荣，再有小掌柜的即栏柜头，有胡彩轩、胡景澍、王佐舟等。他们主要是应付买主，送往迎来，管柜台上人员的态度和讲讲价钱。福丰达丝房都是2分利，一般是不讲价钱的，但买货多了，自然也要争讲一番，这事最后都由栏柜头来定。丝房内吃劳金的当年青的，大致分成绸缎、布匹、烟酒糖茶、米面杂货等几个

织，由柜头负责。丝房的后院有宿舍、更房子、仓库等。特别是要过新年春节的时候，后院一垛垛白面袋子，白面都是克山或拜泉的，还有望奎的，那里火磨发来白面，由福丰达代卖。说是丝房，实际上什么都卖，白面、挂面条、高粮米也卖，香、烧纸、蜡烛也卖。

后来丝房的西边就是福丰达木厂。有门市 5 间，西边临街一排厢房全是作坊。伪满初年打算将原来木厂的房子修缮一下，因木工已有 50 余人，下面管车间干活的，管进料的小掌柜有四、五个，房子少了影响做活。刚把房子修缮完毕，日本宪兵队便要“借用”，福丰达不敢不把那里的房子腾出来，就连万福麟的大哥万福太也不得不把房子给倒了出来。

福丰达吃劳金的，当年青的都不带家，都吃住在买卖家，睡的是宿舍里的长条铺。虽然月月挣钱，但也不准把钱揣在自己的衣兜里，以防止与货款混了。每月挣的劳金钱除了将一部分邮寄给家里外，其余都必须存在账上。留下三元五元的零钱，都装入一个用白布缝制写着自己名字的钱袋子内，挂在宿舍的梁上。谁用多少，都必须经掌柜的给拿，买东西剩下的钱，回来也必须及时交给掌柜的放在钱袋里。这钱袋子不许自己拿，平时也不准回宿舍。

福丰达冬天是七点开门，天一亮起来洗完脸都到烧锅后院的伙房去吃饭，别处没有伙房。这个伙房有 6 间，有六、七个厨师做饭做菜。伙食分小灶、中灶、大灶三种。总经里张翰臣单独吃，吃小灶的有孟化民、高明久、陈耀先、于楚珩、岳凌云、艾从周等几个人。吃中灶的都是些小掌柜的和各号管事的。大中小灶都分开。小灶三顿饭顿顿有四个炒菜，吃大米、白面；中灶是两个炒菜，细粮。柜房的劳

金、年青的煎炸油的，烧酒的，磨米的以及临时雇来的卸粮的，垛粮的一样吃大灶。大灶早饭是高粮米粥、炒豆；午间是带豆的高粮米干饭，白菜炖粉条或者炖豆腐。都是大师傅给盛，每人一碗菜、一碗饭。一天三顿饭，离不开高粮米，也离不开豆腐。豆腐专有磨坊自己做，特别是秋冬最多时伙房内有500来人吃饭。每月只有初一、十五大灶菜碗里能见着肉片，平时没有。

年节放假，大灶也改善生活。福丰达各商号年三十开半天板，过午就关门，春节五天假，初六开门也是开半天板，直到正月十三。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三天也关门放假，正月十七以后就整天开门了。五月初五端午节关门放假，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放假，以后兴过阳历年了，也放假一天。在四月初八、十八、二十八有庙会，卖卖家也放假，还改善伙食，但在白城子也没什么庙会，所以照常开门。在开半天板的时候，都是早八点钟吃饭，九点多钟才开门，十二点一过就关门了，下午饭是两点。在放假期间吃饭，掌柜的和柜伙们一样，都凑八个人一桌，一般是十几个菜。特别是年三十

（除夕）晚饭时，掌柜的都拿着酒壶到各桌去走走，给伙计们倒上一盅酒，说：“一年辛苦了！”那时掌柜的“专制”，伙计们平时在他们面前规规矩矩，不敢说一句话。现在看到掌柜的如此亲亲热热都很感动，就是不会喝酒的也都是一饮而尽。那时的买卖家，掌柜的也不回家过年（春节），就连家住洮南的高明久也不回家。吃完饭之后，伙计们都尽情地玩，有玩乐器、有打鼓打锣的，有掷骰子赢钱的，很是热闹。那时虽然可以请假回家过年，但这期间，回家过年的极少。

正月十七开板时，掌柜的该向大家讲，都是谁每月提多

少工钱了，提了工钱的心情喜悦。那些平时干的较差的就怕在这一天叫掌柜的给辞退了。因为被辞退，找职业困难，受家里责备，同时也难为了保人，所以心里总是忐忑不安。

那时在福丰达学买卖的（当年青的）都是关里人，头三年不给假，三年满了才可以回去“住家”。掌柜的给你3个月假，工钱照发，柜上给拿10元“路资”，不论谁都这些，不够自己掏腰包。另外柜上还给回家的带些小礼物，如红白糖、栗子、枣子啦，都用纸包点。因为来往路费都是10多元钱，柜上拿的钱不够，大家都资助点，关系好的多拿点，关系一般的就随大帮，送上一元钱。回家的都要经过山海关，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之后，山海关是个关口，那里警察对手续不全或他们认为可疑的都要进行盘查，一蹲就是10天半月的，有的还挨打。好在我们的路过证明都齐备，也不携带什么大宗物品，只在证明上盖个戳就通过了。改成吃劳金的，住家的次数就多了，一年半或二年就可以回去住家，假期也是3个月，路资10元钱，工钱照拿。如家中来了急电，有家人病故或病危，掌柜也给你10天半月的假，但必须准时回来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往关内直接通邮，挣的钱两个月、三个月邮去一次；事变后，特别是成立伪满洲国后，关内关外虽然通信、通电，但汇兑不通了。一些在关外的挣了钱，就通过买私人银行的汇票往家汇款。像长春的益发合，在白城子有益发粮栈代理处（只二、三年就撤了）就可以买到益发银行的汇票，功成玉与白城子商家也有联系，给他们一些好处，通过他们汇票就可以把钱邮到关内。这汇票都是软纸的，上面写上你邮钱的数目，人家盖上章，到关里钱庄就给兑换，买东西买卖家也收汇票，多的也把钱

找回来。所以还是明里不通暗里通。后来经济统制越来越紧，各地钱庄不开汇票了，往关里家汇款的路给堵死了，有的不得不把家搬到白城子来。

1935年（伪康德二年）伪满洲国政府的经济部来一个日本人叫山田清作，连同县公署的一些人到福丰达，他们说，福丰达是万福麟的买卖，万福麟现在关内与满洲帝国为敌，他的买卖属于逆产，随即查封，进行清点。据县公署的人讲，要把福丰达的资产全部没收，交大兴当处理。人们都知道交当铺处理意味着什么，他不是经商的厂家，自然不能象过去那样去生产经营，交它处理就意味着拍卖。这时上下的人慌了，我们这些掌柜的就和这山田清作交涉，说：“福丰达是万福麟的买卖不假，万福麟跑到关内也是事实，但我们福丰达上上下下三百来人是满洲国的人啊，这三百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依靠在这买卖干活赚钱吃饭，总得让我们这一千多口人吃饭吧，能把我们饿死不管吗！”山田清作提出要用现金把福丰达卖给我们这些大小掌柜的，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，也买不起呀。最后白城子街上头面人物去说情，由福德兴铎炉经理王介眉和彭金山之弟彭润山出头担保。福丰达推举张翰臣、孟化民、高明久三人出面，写了保证，立下了字据，山田清作又请示的经济部，才决定把福丰达 赔 给我们，期限是八年还清，再次清点烧锅、丝房、木厂、当铺等全部资产，清点结果是12万元挂点零。山田清作提出福丰达每年不管赔挣与否，都要向经济部交款1.5万元；等12万多元交清之后，福丰达的财产就属于你们这些大小掌柜的了。

我是账桌掌柜的，从此每到年底（春节前）都要陪总经理张翰臣到伪新京满洲国的经济部去一次。事先把1.5万

元通过银行汇到伪经济部的账下。再把福丰达一年的生产经营状况作表带上，而交经济部并作口头汇报。伪河洲同经济部就在当时孝子坟西、红万字会附近，后面就是后来盖新皇宫的地方。我们是从1936年春节前开始交代的。到经济部就由山田接待我们，八年都是如此。那里既有日本人，也有“咱们人”（中国人），他看了报表，也不过问什么，我们就可走了。为了讨好山田清作的欢心，我们每次到经济部办完交待后，都要到他家去看看，说一些感激的话。山田清作当时30多岁，家住经济部附近的日本人居宅里。他有妻子和一个小孩，还有一个侍女。我们每次去经济部办完事后，都带上2个三斤半的大玻璃酒瓶子，里面装满了酒，带上一些时兴礼物，并给他家小孩留下10元、20元钱。山田清作这个人很好客，汉语说的也不错，每次去他家，都领我俩去日本人开的咖啡馆去吃饭，喝清酒。有一次还把我俩留在他的家里，他的妻子、孩子、侍女与我们同桌吃饭，表示与我俩友好。

到了1943年（伪康德十年），木厂掌柜的陈耀先去世。我就到福丰达木厂当掌柜的而不是“账桌先生”了，张翰臣仍要我陪他最后去一趟“新京”，我们还是住在西四马路的同增庆里。那时张老翰已过75岁了，上下车都得扶着，但还是最后去了山田家一次。

万福麟的母亲老万太太（王氏）原就在洮南住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因老万家在洮南的房子被日伪政府没收而搬到白城子，住在福丰达烧锅的后院，并带来一个丫环侍候她。烧锅给她腾出两间房，每年在万福麟的福寿堂账内支取三百元、五百元的做为零花。在1935年福丰达被日伪政府没收之后，不但支不出钱来，而且还被撵出烧锅

院外，住在烧锅东墙外一所房子里。那房子是万福麟内弟韩罗锅的，韩罗锅的儿子就是曾当过伪白城子街公所街长的韩成林。那半号街基也是韩家的。万老太太住的房子前面就是日本人开的谷口洋行，即现在市新华书店的地址，后边还有一些住户。此后福丰达掌柜的因怕“通匪”嫌疑不但不给万家生活费，而且也不去瞧看了。1937年原福丰达木厂（原明仁派出所地址）被日本宪兵队“借用”做为宿舍之后，万福麟的大哥万福太也搬到福丰达烧锅院外，与其母住在一处了。老万家的买卖被没收了，房产被强占了，但帮统窝堡的地并没有没收，万老太太母子就依靠那里的地租来维持生活了。

1938年，万老太太去世了，死时80余岁。福丰达的掌柜的还不忘旧情，大家出钱，帮助张罗，进行了发丧。按大人家的标准，雇了两拨鼓乐，两拨经，操办七天，白城子街内很多名流都来吊丧，最后用上好的棺材，三十二杠把老太太葬在帮统窝堡。不久万福太也因病故去，葬在他母亲的坟旁。

福丰达被日伪政府没收之后，因为不存在“东西关系”了，特别是每年还要向伪政府交1.5万元，并报告经营亏损情况，便把过去的“三年一账”，改为一年一结账了。

做买卖的人都知道，要想做好买卖办好工厂，得有一定的周转金，没有周转金要想扩大再生产是很困难的。每年上交1.5万元，相当福丰达全部资金的12.5%，就象人背后被人用刀砍了一下，福丰达从此便逐渐萧条了。当然福丰达也不是从1936年起就一落千丈，而是说先还是保持原状，逐渐萧条下去，最后接近破产的。

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，首先是从政

治上开始的，随后才在经济上逐步实行统制。1932年日伪政府虽然宣布“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案策”，1934年又有《产业统制声明》，但日本侵略者仍把重点放在镇压抗联及人民群众各种形式斗争，巩固殖民统治上，从经济上查还较为宽松些。从烧锅、油坊所用的粮食上，可以自由买卖，不受限制，粮栈仍可以收购粮食，也有销路。丝房经营的布匹、服装，从各地商号可以进货。木厂早已可去山里采购木材。1935年到1937年间买卖形势很好，以后就逐渐不行了。当然这是日伪实行经济统制的结果，但从内部讲，作为总经理的张翰臣虽然老诚持重，但已是70多岁的人，力不从心，每日推着干，只是看堆了。因此大权都落在孟化民的身上。孟虽年轻，经常跑外，倒卖粮食，但由于没有人监督他，便也逐渐不务正业了。他好搞女人，过常逛窑子，在四平还靠出一个窑姐做小老婆，带回白城子，住在烧锅里。由于他胡搞，各号掌柜的对他有意见，张翰臣对他也没啥办法。因而冷了一些掌柜的心。

福丰达被伪政府没收之后，虽然不再放“份子”了，但头两年，除上交1.5万元以外，年终剩余部分大小掌柜的还可以按照原来定的“份子”参加“分红”，后来渐渐不行了，“当年青的”不收了，也没有什么“红利”了，掌柜们的“份子”便取消了，和“吃劳金”的一样都实行了月工资。到了1941年（伪康德八年）以后，工资不但长不了，有时因挣不来钱，工资也迟迟发不下去了。大掌柜的发了话了，他和伙计们说：“谁要愿意在福丰达干就是这俩钱，我们也不撵，要走，你就走，我们也不留”。

首先黄的是福丰当。开当铺的是重利盘剥，相当于高利贷。押当期限短的半年，多的三年，期限越短，盘剥越厉

害，卡是一本万利。在当时白城子街内大的当铺有两家，一是福丰当，另一个就是官办的大兴当。黄的原因有两条，一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，物价飞涨，几乎达到押当的利率，开当铺无利可图了。二是大兴当不但根底硬，钱也充足，福丰当抵不过人家，而收押物品的资金都来自福丰达各号，现在各号周转金少了，没钱了。福丰当是伪满康德七年（1940年）黄的，只留一人处理善后。

最惨的是丝房。丝房掌柜的高明久是1940年病故的，周宪章随即当了大掌柜，仍负责跑外。那时采购什么东西呀？1940年就实行“粮谷出荷”，大米、白面早就进不来了，接着实行“配给制”，又成立了棉布组合，布匹也进不来了。棉布组合长是同兴德的经理孙硕民，由各丝房出钱买布，出人卖布。主持配给的是街公所。棉布来了一批多少，按街内居民每个人一年几尺的定量按数发票，定点按票卖物收钱。配给的包括棉花、白布、线、各种花色布等，凡是身上穿的都归棉布组合，各商号出人只挣点工钱，其余都还街公所。丝房卖的东西多归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，地址就在现在地建公司处。来多少糖、盐、火柴、肥皂等日用品，都归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开票，接商号分拨数量。最后丝房到外采购的就只有大河绉、绫罗绸缎等细货了。这些货下细，人们没有钱，也卖不动，实际上赚钱的东西也没啥可卖的了。1941年日伪政府又公布了“七·二五”物价停止令，警务科的经济保安股经常检查物价，由于物价冻结，货源也断绝了，就只有卖些库存的“货底子”了。1944年底福丰达丝房只剩十几个人，等到1945年每天只开半天板，柜台台、货架子上也没啥东西，剩点东西也没有人来买。许多人站着干呆，都走了，出去做小工、做小买卖。到